

生存媒介：《银翼杀手 2049》中的后人类话语 与数字被抛境况

柳博文^{1*}

(¹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系, 北京 101400)

摘要：作为一种在疏离和认知之间在场和互动的类型作品，本质在于实验的科幻电影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描绘和探索技术客体成为此在的地方。《银翼杀手 2049》在“认知性陌生化”的框架上将镜头聚焦于充斥着政治困境、文化困惑和自我认同危机的赛博朋克未来，通过对人类世废墟的细致描摹及后人类世主体性困境的深刻洞察，丹尼斯·维伦纽瓦在超越性向度的突破下，完成了一场关于时间、记忆与存在本质的复杂思辨。在技术已然深度中介乃至彻底重构了生命体验的世代，救赎何以可能？借助生存媒介叙事，影片深刻探讨了后人类境况下的情感虚拟倾向、昆虫媒介、虚拟人与仿生人的“有死性”、后殖民公司的控制论幻象与“深层时间预期”下的“出生性”议题，为技术媒介渗透提出新的解读路径。

关键词：人类世；有死性；控制论；昆虫媒介；虚拟情感；弥赛亚时间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2i3.1304>

Survival Media: Posthuman Discourse and Digital Thrownness in Blade Runner 2049

Liu Bowen^{1*}

(¹ Beijing Film Academy, Department of Film Studies, Beijing, 101400, China)

Abstract: As a genre that oscillates between estrangement and cognition, engaging and interacting within that space, one of the central themes of science fiction films—whose essence lies in experimentation—is to depict and explore the place where technical objects become Dasein. Blade Runner 2049, framed by "cognitive estrangement," turns its lens toward a cyberpunk future fraught with political dilemmas, cultural confusion, and crises of self-identity. Through meticulous depictions of the ruins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subjective predicaments of the post-Anthropocene, Denis Villeneuve, in a breakthrough of transcendence, unfolds a complex meditation on time, memory, and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In an era where technology has deeply mediated—or even completely restructured—the fabric of lived experience, how is redemption possible? Drawing on survival media narratives, the film deeply explores issues such as the tendency toward virtual affectivity under posthuman conditions, insect media, the "mortality" of replicants and androids, the cybernetic illusion of post-colon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theme of "natality" under "deep time anticipation," offering new interpretive pathways for the penetration of technological media.

Keywords: Anthropocene; Mortality; Cybernetics; Insect Media; Virtual Affectivity; Messianic Ti-

作者简介：柳博文 (2005-), 男, 河北邯郸, 本科, 研究方向: 科幻电影、科学技术哲学

通讯作者：柳博文 2807407279@qq.com

引言

人类的生命总是处在危险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同于汉娜·阿伦特所指涉的充斥着混乱和饥饿、屠戮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的“黑暗年代^[1]”，我们的现状是进入了一种分裂与矛盾的时代，这是一个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能保证其自己具有一以贯之的确定性的时代^[2]。一方面，迅猛的技术变革、科技革命，从纳米技术到神经计算，庞大的信息网络和数字文化中涌现出了接近无限的算力，我们从未离后人类的未来如此之近。另一方面，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这一点在柏拉图的《弗德罗斯篇》中便已有所指，计算决定了现代化的本质，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对最原初记忆——这个一切毋庸置疑的推理和意义的基石——的丧失。技术本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作为解放人类的力量而存在，后现代，政治话语和非人类强度的双重联结已经步入技术媒介的层面：从图像、数码技术到电影、游戏、软件和网络技术，传统的生存论议题愈发与我们的数字生活纠缠在一起，涵盖我们对时间、记忆、空间、自我意识、社交以及死亡的感知，我们似乎被抛入数字化的人类生存境遇之中。

作为投影历史的可读性工具，科幻电影以揭示心因机制的方式实现了对过去潜在因素与残余事物的再现。电影的文化特性承载了或显或隐的集体意识，通过从时间脉络中截取历史过程的片段或部分，透过影像，创作者将给定的书面描述历史“转化”为对等的视听历史。托马斯·沙茨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中这样描述电影的叙事策略，“每部类型电影都通过一个熟悉的社区来建立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沃肖称之为“指涉领域，这绝不仅仅只是物理场景^[3]”。科幻电影最初便是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焦虑的反映，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极权主义的兴起、大屠杀，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中》这样描述，“看不见的手看起来像是魔鬼之手而不是神之手；理性的诡计更像是一个邪恶欺骗者的魔鬼般的精明，而不是一个仁慈的神的意志；辩证的必然性更像是专制的铁链，而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4]”。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这样说道：“理性是一种必须的缺陷，在没有任何可感知的客观数据或现实数据的情况下，它必须能够构想出起源和终结^[5]”。

因此，诸如《银翼杀手 2049》之流的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便不是一个具有专名的未来，而是一条平行于尘世存在的质性的时间。质性的无限与尘世时间不相协调，但它同弥赛亚的当下一样变现为时间的停顿与断裂，一种短暂无常的永恒重复。当多个断裂的异质时间点组织在一起时，无论是线性的时间、循环的时间、进步的信仰还是虚无主义都在形而上学传统上被转变成了一种辩证时间，一个当下永远的危机时刻。正如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也反映着当下的心因模式，当文化断裂发生之时，人们谈论电影中平行于当下的质性时间，支离破碎的主题在可变的星丛中出现并反复再现，透过这些主观意图，在所谓连接性文化盛行的当下，通过后人类主义的论述，我们得以在丹尼斯·维伦纽瓦充斥着“清冷距离感”的影像内思考人类与机器、肉身与数据、基因“代码”和计算机“代码”之间的特殊联结，在追溯性的重建下撇见源始的踪影。

1 情感虚拟化时代：反熵主义与数据塑造肉身

众所周知，存在的问题，即“有死性”下“生命”的意义，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屡见不鲜，同时也被视而不见。在诸如广播、影像乃至信息流的仪式性事件和报纸的想象性社区中，媒介与流行文化充任了宗教的角色，它提供了同生者的交互，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同死者对话的渠道。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及，“电影有一种力量，银幕不是相片的镜框，而是个遮蔽物；从银幕中走出去的人物继续生活着——一个盲画面在不断重复着那部分影响^[6]”。网络媒介天然具有压缩

时间、抹除距离和复制同一的能力，这一超验和怪诞的特性解蔽和遮蔽我们的世界，并且极其危险地引导我们将其看作开发性的资源储备。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曾描述过这种境况，“高速的漂移和滑行中，喧哗的舞蹈和互动的信息充斥其间，四周是黑暗迷宫里数据制造的肉身，绝对投入，又全然分离^[7]”。

马克斯·莫尔在《跨人类主义者宣言》中提及了被称之为“反熵主义”的后人类主义的关键原则，包括“永久进步”“自我改造”“实用乐观主义”“智能技术”“开放社会”“自我引导”和“理性思考^[8]”，作为一种“升级的”人本主义，后人类社会的人类与机器的共同进化促成了智能计算机的超然“涌现”，“开放社会”和“彻底的自我实现”在所谓“后进化阶段”成为可能。诸如《万神殿》《副本》《上载新生》等探讨离身生命与数字来世的影视作品竞相涌现。《银翼杀手 2049》将“生存媒介”的讨论推向一个更激进也更现实的层面，基于人类头脑中的神经模式活动与先进的神经网络计算能力之间的相似之处，当大脑被简化为一组信息通道之际，硬件系统便能够生成人类心智的类似聚合物，《银翼杀手 2049》的女主乔伊便是人工智能的造物，这种被当作“AI女友”的离身生命的身份基于心智文件，而不是有机体的物质化身体。只是，对于仍旧处在具身状态之下的生存境况而言，“娱乐性复制”的人工智能也暴露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基础设施依赖、黑客攻击、存在碎片化境况、技术寡头的操控，恰如作为商品的乔伊无处不在的宣传标语：“乔伊，满足您的一切幻想；乔伊，伴您走遍天涯海角”，数字存在的异化伴随着由内而外的商品化“熵增”风险依旧无处不在。

社会原子化的浪潮下，个体无时无刻谈论欲望，展示自身裸露的欲望是如此轻易，以至于，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词语，甚至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词语。现在一提到爱，人们恨不得生出冷笑。仿佛自然景观愈发荒芜苍凉，城市空间愈发工业集群，爱这样在不甚遥远的过去还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今天就愈发失落。在人类情感日益虚拟化、人与人工智能交互频繁乃至人工智能拥有并取代了人类一定权柄的人之非人的时代，诸如里克和加夫等大断电之前的旧时代仿生人最终屈服于自我流放乃至回归荒芜的原始欲望，这恰巧呼应了列维·施特劳斯“人类普罗米修斯式地盗来天火（选择熟食而不是生食），掌握语言，包含一种离开自然节奏和无名状态的自我流放欲望^[9]”的推测。“我们忆起的是感觉，真实应当纷乱”，当适应性的孤独成为“社会试验”的隐喻，作为“记忆制造师”的安娜·斯特林博士以“技艺人”的身份把自己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只要待在玻璃后面，就能有自由的生活”，她对公众的遮蔽和隐藏行径，便不只是因为“免疫系统受损”，更是艺术家对政治领域和政治的公开性的顾虑和隐忧下诱发的神经官能症，为此，她彻底退出了占据了行动和言谈概念的政治活动，恰如她所言：“只要能得到自由，我就会把握住”，纵使无菌笼的天空狭隘，纵使失去陪伴。

当纯粹的数字技术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也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技术道德化和历史主义的元词中找到伟光正之借口。诸如复制人和改造人等生物工程人类的出现加剧了社会分裂，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消亡，也并不代表人类的进化或退化，相反，它仅仅参与了差异和身份的重新分配，人类与非人类的差异绝对化不是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人类内部的身份所能及。霍尔斯特朗姆的“技术极权终结论”便是《银翼杀手 2049》对福山理论最黑暗的回应，当技术的侵入和掌控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之际，人类的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的人性本能也让步于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和理性标准。“人类就是由数据构成”，乔伊所言非虚，“是工作，是工作将他们塑造成有价值的样子”，除此以外，一切皆为虚无。

托马斯·林奇在《殡葬人手记》中提出死亡分为三次：肌体死亡、代谢死亡和社会性死亡，分别是心电图等医学测量上显示的死亡、生物神经未梢确定的脑死亡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维度的死亡^[10]。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死亡也再度被置于虚拟空间讨论。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人之为一个基本条件。首先，死亡无处不在；其次，死亡无可避免；最后，死亡是明显迫近的。因此，一个人只有接受了自己的限制，并对自己的生死做出适当的回应，这个人才算是本真地活

着。虚拟生命的困境在于，其“数字来世”是人造的技术产品的衍生物，它更像是一个技术囚笼，在中断与虚空、沉默与断裂、限制与局限中充斥着哲学困境、存在异化、殖民奴役和社会隔离，当生命最基础的体验被剥夺之际，网络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充满了黑洞。因此，当乔伊毅然决然选择放弃云端、回归硬盘的那一刹，里克“有时，爱一个人，就要变成陌生人”的箴言在虚拟生命之上生效，那一瞬间，她得到了人之为人的本真性，在有死性的永恒安宁下进入永恒世界之诗篇。

2 在场与缺席：昆虫媒介与控制论幻象

“人对太空的征服是提高了他的地位，还是降低了他的地位”，《当代伟大观念》的编辑们曾提出这样一个“太空讨论会”之问，显然，这是一个指向性明显的问题，任何俗世中人都可以在茶余饭后就此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它指向了大叙事话语下人在本体论层级生发的疑惑，即“太空探索如火如荼的年代，人类如何关照自身”，以及“人之为人的前提之下，根源性的干预和混淆何以生发”。要理解人的本真性和先觉性，似乎不仅需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还要求更极端的，对底层心因结构神人同形同性的因素和模式的摒弃。或者说，这个前提成立的先决条件，便是否决人是我们已知的最高级存在。太空探索将人的存在缩小为有机生命的一种，而非特例，这让人联想到昆虫群落：单独存在时毫无价值，与环境耦合时却非常高效。太空探索者被嵌入一个昆虫面相的感知世界中，兼具情境化和具身化，这是一种跨个体化的个体创生，它表示着广袤的寰宇之间，所感即所是。

维伦纽瓦的《沙丘》开篇，我们便得以窥见虫群、分布式智能、昆虫组织模式乃至昆虫形制的粗野派建筑的踪影，哈克南人将族群的力量缩约到特定的共鸣环境之中，哈克南公爵的扩张性立场便在族群与他们的环境关系之中被一并创造出来，每一个哈克南人都是这一主张的共谋，哈克南人共享感觉、知觉与情动。而在《银翼杀手 2049》之中，华莱士公司的内部装潢则更加隐晦，一定程度上，华莱士公司的建筑集群同哈克南人的宫殿共享分布式的、实验性的、变形化的组织，十分轻易地，我们可以联想到某类节肢动物生命体。只是华莱士公司在相互穿插的空间中营造了一种分散化的空洞，指向某种隐晦的、冰冷失序的掌控欲。冰冷的金属、光滑的深色木材与混凝土在昏黄的灯光与水波映照下“细节奔涌”，日式极简主义的空旷、留白与粗野主义的粗旷、厚重相杂交，一种“神圣的暴力”在自我相似又无限悬浮流变的分形几何式空间内实现整合。而哈克南人的宫殿形制则更加直观，府邸的通信网络、另类机构网络与神经中枢显然是虫群生态的复刻，作为一种技术媒介社会的动物力量催化剂，传递着一种潜在的连续性，来自虫群与族群。正如彼得斯所说，当“信号的捕捉和扩散意味着人类个性的视觉和听觉标志不再与个人身体在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时，一种含混的动态模糊性便出现了，“虫群”的痕迹似乎无处不在，或许恰如尼安德·华莱士所说：“精确的数字推算下，痛苦会提醒你，你感受到的快乐是真实的”，只是，只有自我终将趋于泯灭。

理解了这一逃脱了现象和表象束缚的理念，《银翼杀手 2049》便展现了这样一个无法同感官、常识和经验所理解的真实的悖论—即物理上客观存在的东西在未经审视前绝对不会显现，而不经意间揭露的真实又会毁掉原先所构筑的生活的一切。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技术已使人不能直接在场”，华莱士公司统辖着影片中一切的智能设备、媒体传播与虚拟现实之媒介，以至于，员工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符号系统控制仿生人的意识与行为。众所周知，这种人类中心和自我工具化的理念必然招致理论与行动上的混乱，因为它的数据和枷锁是人为划定的。仿生人的定义便从《银翼杀手》中的“极为近似于人”到《银翼杀手 2049》中的“理想的生物工程奴工”。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以自身为标准奴役和划定界限的行为最终导向的往往不是奴役群体的反抗便是奴役群体的自我毁灭。因为领会与怀疑实际上是心灵的功能，而不是刻板的脑力机械运动的造物。作为银翼杀手，K 肩负着追捕和强制退休仿生人的任务，他自身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身份与

认同的质疑当中。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仿生人的身份建构，从其族群诞生之初便是殖民屠戮和自我矮化的领域，无论它的起源和它最原初的样态为何，曾在历史境遇中激起多么波澜壮阔的斗争与自由幻象，在记忆植入与垄断公司充斥着层出不穷的技术幻象的时代，仿生人已然触及不到实在，他们只理解向华莱士公司向他们显现的东西，而对族裔的过去、当下和未来漠不关心。他们的问题和焦虑由孤独、虚无与不可避免的原子化浪潮引起，以赛亚·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中不无担忧地提及乌托邦观念的衰亡，“任何人决意去谋求解决的话，只可能招致苦难、幻灭和失败，不仅在实践中如此，原则是也是这样^[11]”。完全不可知的过去剥夺了过去一词的全部含义，过去仿佛从未存在，未来也不会随之到来。因为，在尚未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时，我们就害怕失去了。

3 与世同在：“深层时间预期”下的时间架构

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记忆呈现”，历史书写是世界的断裂与梦幻的碎片集聚的造物。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阐释历史主体时提及辩证意向“并不是过去阐明了现在，或现在阐明了过去。曾经、当下、未来在瞬间相汇，形成星丛^[12]”。辩证意向可以中断历史进步的线性进程，斯蒂芬·杰·古德在《时间的箭头，时间的周期》一书中对深层时间定义为“几乎是一种无法理解的概念，它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以至于我们只能把它理解成隐喻^[13]”。《修女安魂曲》中，福克纳立下“过去永远不会死，甚至也不会过去”的叙事宣言，本雅明也将日记描述为“不朽的时间”，历史和未来在并置中消解着命运决定论。“过去”慢慢地消亡之际，为了能更好地记忆“过去”，“当下”被下意识阻拦，而过去则被有意“拉长”，那些失语的、被历史人为抹杀的、迷失的记忆持续地、危险地保持在场，时间之内别无他物。

所谓“能动意向”从亚里士多德的“蜡块说”和“鸟笼模型”及罗马的记忆术开始便被认为具有超凡脱俗的记忆能量，回忆在不断覆写和重构中转换其范式，在流传断裂的间歇，想象自然而然地发生。乔伊在 K 心神不宁之际戚戚然安抚“我想给你真实的感受”，安娜·斯特林博士在“想象”的工作中坦言“如果记忆是真实的，就会有真实的人类反应”，认知的能力，心灵的能力，在忘却的坟墓和无家可归的过去折损、酣睡并埋葬于想象的凝滞。在卡夫卡的书写之中，“一个人的死亡如同周六晚上对于烟囱清扫工，这时他们要清洗身上的灰尘”，随即，当下收容了未来。对 K 来说，他此时此刻所做的一切，决定着此后他的每时每刻。美国物理学家波尔金·亨在区分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时提出：“不同于经典物理学所描述的清晰而稳定的世界，量子物理学描述的是迷雾般不确切的世界^[14]”，量子跃迁能够回应乌洛波洛斯式的时空感知。K 没有选择和宿命，每时每刻都是他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他的悲伤来源于他的欢愉，他的欢愉来源于他的悲伤。虚构的蜂群、全息的爱情、虚假的木马、折断的花束，荒芜世界间，生态系统的崩塌与科技奇点的降临交织，在逐渐空洞匀质的线性的历史进步的时间之下，人类自身愈发由碎片世界所囚禁，弥赛亚降临的时刻被一再推迟。而收聚着过去和未来的当下是一次停顿，纵使“最终的审判”持续延缓，当下的每一秒时间都可能是弥赛亚降临的狭窄之门。这样一来，K 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他个体生命中的弥赛亚事件，在灯红酒绿的消费景观下，在幽暗无垠又近乎虚无的夜空中，在一次次等待和断裂里，悬而未决的弥赛亚救赎制造出命运的幻象。

诸如 K 的存在者处在一种独断且全知的主体性神话之外，他们既不是全知全能者，也不是“万物的尺度”，他们只是现象学和情感意义上的“在世存在”，是凡夫俗子，他们受制于社会的原子化浪潮，也在拒绝的反叛之下愈发失落。面对未知和虚无，他们只能选择自我悬置，或是不可避免地退回到先前的领域。在绝对可能性的摇摆状态之下，K 看似拥有了自由和选择，但这种缺乏张力的状态不过是一条具有欺骗性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自认为掩盖了边界状况，却依旧处在一片混乱的状态，客观性被冻结于无动于衷之中，而主观性业已走向迷失。直面人生的虚无与荒诞，并同世界疏离过后，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这样写道，“如果今天我们

在绝望之中问到：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什么留给我们？那么，对于每个人，答案都是，你自己，为自己的真实本性而斗争，他要么维持自己的真实本性，要么丧失它”^[15]既然开放性、残缺性和依赖性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具有一种对自我的信仰的真挚的人便达成了崇高。仿生人地下反抗组织的标语：“如果我们能孕育生命，那我们自己就是主人。为正确的事业牺牲，是我们能做的最人性的事”便是对雅斯贝尔斯的互文。本雅明在《神学-政治学断章》中抛出了一种悖论关系，世俗运动趋向的目标和弥赛亚的动力互为一条直线的首尾两端，这就必然导致追求自由幸福的普世价值观同弥赛亚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一种力的作用必然导致与其相反的另一一种力的加强，这也是在诸如《2012》、《明日边缘》、《星际穿越》等末世题材电影中末日从未真正降临的原因，在寂然无声的弥天大雾中保持本真，当人们寻求听见赫尔墨斯所说的“光之呼喊”时，向死而生的人类在万物的生长、时间的流逝和上下求索之中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末日”危机。对仿生人来说，“出生”，即拥有人的复数性，即拥有灵魂，即在无意义性、可悲偶发性和融贯性的“时滞”泥沼之中“创造历史”，在自然世界和人造世界双重失落的境况下，人无论往何处去，遇到的都是他自己。

4 结语

后人类境遇之下，人类仍然以一个存在者的身份立身，作为具身的、关系化的、不稳定的、肉体终将泯灭的造物，在面临技术洪流和新时代的生存焦虑之际，人类也许会失意，也许迷茫、脆弱、受伤、失语。意识层面，全体人类都在为生存而奋斗，而在更深的潜意识层面，我们渴望的是静静躺下，让非生命的寂静之水浸过我们的身体。恰如伤痕累累的K倒在阶梯上，暗银色的雪花飘落，看着那些高大的钢筋丛林，他完全醒着，好像对自己发笑，整个洛城都在下雪。纵使散落的惶恐、错愕与虚无无法根除，但无论是革命带来的使历史辩证跳跃的变革性力量，亦或是危机关头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科技力量内所萌生的当下意识，都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于人类世黄昏中获得终极意义、自我充盈的可能性时刻，为了这一可能性时刻的降临，我们有理由在审慎之中对未来保持憧憬、守望和期待。

参考文献：

- [1] (美)汉娜·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人们[M]. 王凌云,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1.
- [2] (英)齐格蒙特·鲍曼. 怀旧的乌托邦[M]. 姚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220.
- [3] (美)托马斯·沙茨. 好莱坞类型电影[M]. 冯欣,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0.
- [4] (美)迈克尔·艾伦. 吉莱斯皮.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M]. 张卜天,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368.
- [5] (法)贝尔纳·艾伦. 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M]. 裴程,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67.
- [6] (法)罗兰·巴特. 明室: 摄影札记[M]. 赵克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5.
- [7] (美)威廉·吉布森. 神经漫游者[M]. Denovo,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3: 117.
- [8] Max More, Natasha Vita-More. “The Exrtopian Principles: A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 [M].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3: 99.
- [9] (美)乔治·斯坦纳. 语言与沉默[M]. 李小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45.
- [10] (美)大卫·伊格曼. 生命的清单: 关于来世的四十种景象[M]. 赵海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31.
- [11] (英)以赛亚·伯林. 扭曲的人性之材[M]. 岳秀坤,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17.
- [12] (葡)米格尔·梅斯基塔·杜阿尔特, 惠政. 让-吕克·戈达尔与瓦尔特·本雅明: 元历史、辩证意向和世俗神学[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3(08): 8.
- [13] 秦轩. [J]. “深层时间预期”与“弥赛亚时间”——“时间的架构”中夏邦的犹太历史重构及其民族标识[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03): 14.

[14] John Polkinghorn. Quantum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15]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王德峰, 译. 上海: 生活译文出版社, 2013: 226.